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和党的基本路线 学 习 纲 要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
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

组编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 党的基本路线学习纲要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 组 编
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
党的基本路线学习纲要**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讲师团 组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省供销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73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4次印刷

印数255,150—260,650

ISBN 7-221-00841-8/D·08

定价2.10元

味分野對創聚時義主会并

要聞區洋發征本基的党

主 编 常 征
副主编 谢合宽 黄钧儒

参 审 组
中 共 貴 州 省 委 宣 傳 部
中 共 貴 州 省 委 文 書 室

發 行 所 入 人 限 貴

编 者 的 话

为了适应我省广大干部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我们以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指导,根据中宣部理论局拟定的教学大纲及我省实际,组织编写了这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学习纲要》。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省委宣传部常征(第一题),省委讲师团何学德、蒋先进(第二题),刘大志、钱进(第三题),省委宣传部黄钧儒(第四题),省委讲师团吴家革、罗运明(第五题),谢合宽(第六题),谭晓玲、李晓华(第七题),省委宣传部路长发(第八题),省人民广播电台路中雄(第九题),贵阳医学院黄国定(第十题),贵州大学郭文运(第十一题),省委党校王棣章(第十二题)。附录部分由省委宣传部吴黔斌,省委讲师团刘正品、安慧林摘编。参加本书初稿修改的有谢合宽、黄钧儒、何学德、路长发;由谢合宽、黄钧儒统编,常征定稿。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88年9月10日

目 录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	(1)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18)
三、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32)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45)
五、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61)
六、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77)
七、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95)
八、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111)
九、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	(126)
十、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和统一战线·····	(142)
十一、加强党的建设·····	(157)
十二、振奋民族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172)
附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学习参 考文献摘编·····	(186)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曾先后几次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并以此作为立论基础，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历史地位、根本特点、主要矛盾、中心任务以及发展动力和条件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践，初步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结果，是对社会主义和我国国情进行反复再认识的科学概括，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这一科学理论，不仅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问题，是当代世界的“热门”话题。除了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以及我们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国家也声称在建设社会主义。然而，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当中，有的是科学的，有的却

并非科学的。就是在苏联、东欧以及我国，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存在不清醒、不准确、不科学的地方。人们讲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事实上却附加了一些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因素。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我们应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发展，不断进行历史的反思，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

“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欧洲。人们开始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并没有赋予统一的、确定的含义。到了19世纪30年代左右，“社会主义”渐渐成了批判和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理想的流行词语。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在欧洲一些先进国家里已经确立，而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开始暴露，并日益尖锐和突出。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巨额财富在迅速积累；另一方面，小生产在大量破产，工人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在日趋加重。于是，人们开始起而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和出路，“社会主义”便应运而成了这一系列方案和出路的总的名称。当时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社会主义思潮主要的和最高的代表。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仅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而且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和天才的预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新的奴役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是“黑白颠倒的世界”。傅立叶指出，资本主义雇佣制是“复活的奴隶制”，资本主义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欧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圣西门、傅立叶更尖

锐、更深刻。他把批判的锋芒直指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私有制，指出私有制使人类世界成为“疯人院”，使私有者成了利欲熏心的“两脚兽”。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不久，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便看出和揭露了这个制度当时存在的严重弊病，无情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腐败和残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剥削实质，但毕竟为启发工人的觉悟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三大空想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天才预测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美好的制度来代替极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合理的美好的社会，圣西门的设想是实行“实业制度”，傅立叶的设想叫“和谐制度”，欧文的设想则称之为“公社制度”。未来的社会一切人都要劳动，都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失业、懒惰和一切寄生现象都将被消灭。圣西门认为，在新的社会里国家将会消亡，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傅立叶设想在“和谐制度”下，旧的社会分工将被人们根据兴趣自由选择工作所代替，劳动将成为人们的乐生的需要和享受。尤其应该强调的是，他第一个提出了妇女解放是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的天才思想。欧文设想的“公社”里，要取消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不再有什么资本家和工人之分，也不再存在贫富的差别，人们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直接为了满足公社社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上述简要的叙述表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设想和预测的确含有伟大的真理，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大的启示和积极意义。

当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带有虚幻和空想的性质。因为他们不是根据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来考察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从头脑中抽象的理性原则来推断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由于他们没有找到实现新社会制度的现实道路和社会力量，所以他们的学说必然陷入空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社会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受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制约的。19世纪初期只能产生空想社会主义，而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分不开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①

但是，三位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预见，仍然不愧为人类的先进思想，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②科学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③

那么，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呢？

科学社会主义也叫科学共产主义。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往往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虽然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但是并没有明确界定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把社会主义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1页。

专门指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是列宁。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作为同义语使用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是一回事。

科学社会主义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科学社会主义的狭义含义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即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或者说是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广义含义，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即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整体。

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迄今已有140年的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以及基于这种矛盾发展而发生的工人运动的产物，也是吸收人类科学文化知识和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为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提供了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一百多年来，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世界工人运动不断发展，一系列国家的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同时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 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同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

合，不断研究和回答社会主义实践中涌现的新问题，并使自己从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历来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也曾一再强调，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正是我们党紧密结合实际生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深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结果，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反复再认识的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重大突破和最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科学社会主义自创立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发展。从学说与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后的基本发展过程和经历的基本发展阶段。这个发展过程和这些发展阶段，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的结合，也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然而，事实上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基本上原来都不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十月革命以前，经济上大体相当于当时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程度。在当时国际国内社会历

历史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大致说来是高度集权、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的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但是却具有严重的弊端——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政治上缺乏民主，经济上缺乏活力，思想上陷于僵化，以致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这种苏联模式，曾经影响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已经先后觉察到这种模式的危害，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改革，就无法打破僵化，无法克服停滞，无法摆脱落后，无法建设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到头来也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要前进，要发展，要胜利，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但是，改革是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是长期而又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势必层出不穷地涌现，需要进行理论的研究和说明。科学社会主义要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指导改革前进，就必须开拓新视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以永葆自己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

我国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我们是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经过为时不长的过渡时期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我们面临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同。在我们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发展中碰到的崭新课题。我们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严格讲来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许多国

家通常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国家工业化以及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我们还远没有实现。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既没有现成的书本可以照抄，也没有现成的外国经验可以照搬，而必须从我们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所讲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为了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作过有益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经历过多次挫折，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我们一犯再犯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一味求公的错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降到次要地位。似乎不经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只要坚持所有制的“穷过渡”，任意“拔高”生产关系，就可以很快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们往往脱离生产力标准空谈社会主义的抽象原则，既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又混淆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主义”加以反对，动辄批“资本主义复辟”，堵“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

主义尾巴”，反“资本主义复辟”。由此而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党之所以一犯再犯“左”倾错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一再遭受严重挫折，都是同我们不能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而陷入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分不开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是决定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状况、性质和发展要求。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并最终引起整个社会的变革。当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巨大的反作用。生产关系要不要变革，上层建筑要不要变革，它们如何变革，变革的方向是否正确，变革的效果是好是坏，这一切都以是否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性质和发展要求为转移。在这里，生产力标准是决定一切的。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致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陷入盲目性和随意性，干扰、妨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这些本来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观察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本来首先必须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是，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常识忽略了、遗忘了，甚至否定了。口头上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却陷入了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于是，别说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是共产主义发展阶段，都成了可以信口开河、任意升降的东西，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被种种空想搅得真假难辨，是非不明。1958年“大跃进”时期，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闻名全国的河北某县，当时粮食亩产不过二百多斤，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不过130元，生产力极其落后，人民生活还很贫困，温饱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却提出1959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他们凭什么这样宣布呢？主要的就是凭全县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取消工商业，房屋、家畜等财产“全部归公”，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实行供给制，工人、干部取消工资，农民取消工分，生产上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上实行“大协作”、“无报酬”。他们就是依靠这些来“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显然，这些同科学社会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相悖的。但是，这种荒唐可笑的现象，当时并不只是发生在这一个县，可以说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只要坚持“一大二公”的公社化，人们马上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当时我们贵州也不甘落后，搞“穷过渡”，搞“一片红”，高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是，历史唯心主义是不能不碰壁的。种种空想，再“光辉”、再“美好”，是不会不落空的。企图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做法，使我们受到了极为惨重的惩罚：生产力遭到极

大破坏，人民生活陷入严重的困难，整个经济建设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三年困难时期”以灰暗的色彩载入史册。

令人痛心的是，“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的惨重教训，并没有使我们彻底觉醒。特别是没有从理论的高度，深刻总结脱离生产力的发展，任意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教训。“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以及其他原因带来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给主观唯心主义的狂热泼了一盆冷水，人们热得发昏的头脑有所清醒。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没有根本转变，所以不可能真正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一味求公，一直是某些人头脑里固定不变的“社会主义”公式。尽管一时的浮夸和狂热可以被制止，但是任意混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远远没有从理论上得到总结、澄清和彻底纠正。一旦形势有所好转，人们便把过去的教训置之脑后，好了伤疤忘了痛，“左”倾空想错误不但再度发生，而且以比过去更大的规模、更大的范围、更长的时间、更重的程度肆意泛滥，愈演愈烈，在十年内乱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我们党着重从组织上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清查，还没有来得及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全面的清理。当时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左”的流毒仍然相当严重、相当广泛地存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才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全面地认真地清算“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